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 三民主義週刊



第一卷 第十六期

## 本期目次

三民主義者之學術的研究——革命學

梁寒操

太平天國的政治思想與制度

程仰之

中國民族主義之發展與台灣革命運動

梁乙真

綏遠前線歸來

張彝鼎

蔣委員長的任務(附錄)

斯文赫丁

分二角五元三年全定預

角五元二年半 角一冊每價定

店書大各國全處售經

社刊週義主民三 及輯編者行發

號三十路森春寺清上慶重

重慶上清寺春森路三十號

# 三民主義者之學術的研究——革命學

梁寒操

總理說：「凡一切學術有可以助革命之智識及能力者，余皆用以為研究之原料，而組織成余之革命學也。」

三民主義的青年，最要緊地是求什麼學問呢？  
我毫無疑義的答，就是革命學。

革命學這一門學問是現世全世界學校所沒有的，那裏去求啊？那就要知道 總理全部的學問，就是「革命學」。

有什麼紛擾嗎？請看 總理和邵元冲先生的一段談話。邵氏問：「

先生平日所治博於政治經濟社會工業法律諸籍，皆嘗呼無稽，畢竟以何者為專攻？」 總理說：「余無所謂專也。邵又問：「然則先生所治者究為何種學問？」 總理答：「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學問也，凡一切學問有可以助余革命之智識及能力者，余皆用以為研究之原料，而組織成余之革命學也。」

總理在黃埔第三期畢業生演說時亦有云：「革命之學，大學也，革命之道，大學之道也。」在他革命學的重要這一篇演講中，並說「這篇序完全是 總理遺教致給我們的道理演說出來，沒有參加一點我個人的意思，」這都可證明 總理所學問是革命的學問。

什麼是革命學呢？革命學從那裏來的呢？總理告訴我們：「革命的學問，並不是另外求來的學問，而是中國固有的學問。我們一定要把哲學來源研究清楚，有了這哲學的基礎，然後我們的人生觀，才能確定一切的政策，成敗，利害，生死，才能看透。」（見革命哲學的重要

為什麼說革命學是中國固有的學問呢？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擬從大學研究。大學這本書許多人說：「

總裁也重現它。它裏面有所謂

三綱八目，現在把要地和大家談談。

（一）大學開宗明義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於至善。」這三句話不特是全書的綱領，也可說是革命的三大目標。現在按次略述如下：

第一個目標是「明明德」。「明德」是什麼？就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良知良能，是人類所獨有的高尚的精神作用。從生物進化研究，只是人類才有這種複雜微細的精神作用的，因為有了它作基礎，所以人類才有今天的輝煌的文化。至於其他的生物具有這種作用的可說微乎其微。譬如一只馬一只猴子，至多可以教他認數目字或要把握，你絕不能教他懂得三民主義，因為它們根本缺乏人類的先天條件——人類的良知良能。你盡說得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絕不能種瓜得豆，種豆得瓜。你盡說得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絕不能種瓜得豆，種豆得瓜。」明德」是孔子所謂「處變不昧」，我們身中總似有一物，呼之欲出，人人皆有此感覺，這物就是一「靈」，也就是「明德」。人類之所以為人類就因為有了它。

「明」明德的明字，就是「發揚光大」之意。把我們的良知良能，發揚廣大，發榮滋長，就是「明明德」。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长；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目前人類所以造孽，所以犯罪，就因為「明德」不能「明」，「明德」失去，以至於乾枯消失。一切生物的

考官，愈用則愈顯，這是大家公認的。譬如我們右手比左手壯大，就是用得多的原故。多參加辯論會演講會，口才一定會進步。我們的心——就是腦力也可，明德也可——最怕不用，如果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這心的大用一定消失。

在這裏我們便要研究「知一與一行」的問題。總理訓示我們：知難行易。難易是比較之詞，但知確實是太難了！如果有人以為自己無所不知，他便是世界上的唯一善材。世界事物，繁雜萬端，神妙無窮，而且日日進化，永無止境。人生數十寒暑，縱使白首窮理，也只能知一縷步沙灘所檢得的一些貝殼一，誰敢說自己是已得真知，是無所不知呢？可是最近許多人為研究這知與行的問題，頗發生一種疑竇。因為總理說「知難行易」，總裁又提倡致「良知」，勸人「有良知要能致」，他們以為致「良知」是王陽明的主張，王氏謂「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主張「知行合一」，總裁既然說「知難行易」的學說，何以又要提倡「致良知」？這是不是有些矛盾呢？據個人細心研究的結果，說「知」兩字，並無衝突，而且是一貫的。這首須明白「知」與「行」所指的意思實在不同。王陽明先生說的「良知」，是種直覺的知，良心的知，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只要把私心物慾去掉，良知自然發現了。譬如一面鏡子，被塵垢所蔽，所以失明，倘把塵垢拂去，自然回復鏡子的本來。古人說：「人之大患，在蔽與私。」以私所蔽，因蔽而復；愈私愈蔽，愈蔽愈私。所以致良知的唯一有效辦法，就在「存誠」二字，只要去私心，良心自然不蔽，這是做人的必要條件，比較容易做到。但

總理所說知難的「知」，乃是指一種「真知」，是一種科學的知。科學的知便不是隨便可以得到，更不是不懂科學方法所能得到。王陽明因為格物窮理的竹子，格了七天七夜，結果格不出竹子的道理，反而格出病來，於是廢然思返，有一「草一木皆有理如何去格」之嘆！就是證明求科學真知之難。因為那時候完全沒有自然科學基礎，他既不懂得植物學，更

不知今日科學所講之電子原子細胞，全憑玄想，當然找不出一個究竟的「真知」來。這證明科學的知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以上是從明德說明「良知」和「真知」的差別難易。良知是屬於人格道德之事，而其知則屬於思想知識之事。良知尚較易，真知則大難。但無論「良知」與「真知」都是人類精神所獨具。人類自呱呱墜地就帶來了一件寶貝，就是「良知」，兩件寶貝的「明德」，我們有了這件寶貝如果不知道去培養它，發揚光大它，還不能不說是我們的愚昧了！普通人失去了財物，他會很着急地四出設法，而失掉了自己的寶貝——明德，反而行若無事，就難怪孟子譏笑我們「人有為大故則知求之，放心而不知求」，發出「哀哉」的嘆息了！

第二個目標是在親（新）民。民是人民。親又讀新，兩種解法，都有道理。親民是不離開國家，新民是一日日新，又日新之意。總之，從一個人一明明德一做起，由內部而推廣到外部，由個人而推及羣衆，使天下人都能夠各明明德，這是新民二字之意。總裁在「科學的羣衆時代」一文中所說的道理，就是親（新）民這個道理，在今日時代之最正確的發揮。大家想都已看過，就是人我一體，日日新，又日新，天天求進步，日日求改善。具體地說，就是培養身心，豐富生活，復興民族，改造人羣。

第三個目標是在止於至善。一革命之學，一在止於至善一，而求達「止於至善」，善須「止」。所謂「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但至善這一目標實可說是無窮的遠大，終生行之，子無疆之，沒有止境的。所以這個「止」字就等於「無止」。大家都知道人類有三大目標，就是求真求善求美。而至真至善至美，就是人類至善之境，什麼是至真至善至美？大家是不能在現在下一個定義的。所以至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進一步更有一步，進一步更有一境，可是步步不同，境境有異，沒有終極。古人說：「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人生之所以有意義者，正在於此。

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於至善」就是革命學的主要因素。這三者是中國古代政治哲學的根本，也是構成革命學的主要因素。所以我們說，革命學不是外國來的，是中國固有的。

（二）大學八目是革命學由思想生信仰，由信仰生力量，由力量生程序。

我們以科學的精神研究世間的事物不外下述三大範圍：即（一）是何（二）為何（三）如何。以上所述，是說明革命學「為何」這一項，以下我們要從「是何」「如何」去解釋革命學。為着便利說明起見，繪了一個圖在下面：



并把 總理對這一思想體系的意義引證一如下：

「……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麼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麼政治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中獨有的寶貴，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今天要把它放在智識範圍內來講，才是適當……」民族主義第六講。

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要生思想，思想發達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義是由思想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力量，然後完全成立。」這又是千古不磨之論。總理這種真知卓見從那裏來的呢？就是從大學的八目來的。在王表所顯示，我們先要知道人以修身為本，即從個人做起。怎樣修身呢？要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做起；格物致知就是思想，誠意正心就是信仰。現在把要關連如下。

什麼叫格物？要明白這意，先要明白什麼是「物」。「物」就是天下事物。人類是處於宇宙萬有事物的中，因為我們是有精神有靈明，決不甘心寂寞而過一輩子，凡百事物，都要尋根問底的找出一個真理來。這種精神作用原是一種本能。小孩子看見什麼東西都喜歡盤問，就是這一作用。這種精神就是格物精神的基礎。格字是什麼意義呢？明末清初的顧習齊先生解釋：「格是齊格猛獸之格」，朱子解釋為「格，至也」即以求至乎其極之意，這都是切當的解釋。所謂「格」就是必有射觀體驗，必須尋根問底。這兩種精神合起來，就是格物的態度。換句話說就是科學態度和哲學態度。總理曾說過人類文明完全由於科學哲學之賜。科學由於觀察，哲學由於判斷。科學態度是一種認真態度，「一草一木之微，無不精心研究，一點不能模糊，深入到每個問題的核心。可是這還不夠，我們還得要跑到這問題的外部連同其他問題來總合地看看，這就是哲學的態度。我們對天下事物要下適當的判斷，就要具備這兩種態度。在古書裏我覺有兩句話很值得我們注意，就是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傳的心傳：「唯精唯一，允執厥中」，據我的解釋所謂「唯精」就是科學的態度，所謂「唯」就是哲學的態度。「允執厥中」就是要先求能做到的「唯精」和「唯一」的工夫，然後「允執厥中」去找出最適當的判斷來。

格物的目的何在？在致知。總理提倡「知難行易」，是從他畢生的經驗發明的，完全是針對「知之非難，行之非易」這一種錯誤之見而

費的。這兩句話不知驚醒了多少人，支配了多少年代，總理認為這是他生平的第一敵人，所以悉心研究，才恍然大悟於古人傳說的錯誤。其實，古代有大智慧的人都是認知爲難的。像孔子就深懂知難的真理。他曾對子路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這就是求真的科學精神。他又說：「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審」字是博學之，審問之的審。就是說，我們不要以爲自己胸藏萬卷，便無所不知，而應該「審」其所知，要繼續實地知道，才是思想貫通，才能發生信仰。所以知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科學態度哲學態度去格物，由躬親體驗，尋根問底去致知，這種功夫做到了，於是思想才貫通，這是主義成功的的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是信仰，就是誠意正心的工夫。經過格物致知的階段，思想一旦豁然貫通，覺得這一個道理再算不過，再好不過，可說已至乎其極，那我們對這種道理，自然一定能夠誠意篤信，絕不同於標語口號喊。這是由自己經過千辛萬苦，所求得的真知。所以我們才願意信仰它，爲它而奮鬥而犧牲，這就自然發生力量。總裁在「革命哲學的重要」裏說：「如沒有哲學的基礎，在論理上政治上，就沒有確定的人生觀

臨到危險的時候，就難免於變節。臨到富貴賤轉瞬的時候，也難免爲變節。」這就是說明一個人的信仰在革命上之重要。人生不能沒有信仰，革命更不能沒有信仰。怎樣成功信仰呢？信仰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倉卒之間可以發生。他必定經過自己好學深思的工夫，走入真理的堂境，才能產生出來。信仰既立，則其心自正，其意至誠，絕不爲情蔽而有所偏，不因為外誘而有所搖。才配本着信仰的真理，一往直前無所疑惑，無所畏懼。

爲什麼我把修身放在這個八日圓的中間呢？因爲這是每個人的基本工作，一個人把格致正的工夫做到，思想貫通了，信仰確立了，對於本身的健全工作已經相當夠了，這樣就可以發生力量。依力量的大小，可以齊家或治國平天下。以現代語詮釋，就是說信仰真理的人，可以改造家庭改造國家改造世界。從內部到外部，從個人到羣衆，從精微到開展。這種中國古代政治哲學的實質，就是「總理的革命學根據」。懂得這個道理，遵循這個道理去實行，我們的工作便一輩子都做不了，我們的人生便有無窮的意義。

總裁於前數三週年紀念日告全體同志書中說：「進念 總理之偉大，蓋可以二語括之，一曰無所私，二曰無所畏。總理竭其學生之心力與時力與生命以貢獻於中國國家與中國民族，亦只不忍其淪亡而拯救之，其目的即在求得自由平等。由人類道德言之，此乃至公而非自私。何以無所畏？蓋 總理絕對信賴民族精神，洞知我民族固有道德與固有智能根基之深厚，確信我民族果一旦覺悟而奮鬥焉，定能發揚偉大之力量，摧殘一切之障礙，克保永久之生存。我有革命，誰能阻之？我不自亡，誰能亡之？惟 總理正本其所私，故更絕對無所畏，綜此二義而得之結論，即 仰國家民族之必獲救，三民主義革命之必告成；而其惟一條件，即爲奮鬥與犧牲。」

## 太平天國的政治思想與制度

程仰之

程先生是國立中央大學政治系教授。他這篇大作說明了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是以民族、民權、民生三項為目的的革命運動，而三民主義正是適應中國這百年來的歷史使命所形成的主義；實是一篇對於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極有供獻的文字。

編者

太平天國的革命，爆發於公元一八五〇年，（清道光三十年）消滅於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其勢力所至，則從珠江流域發動，而蔓延於長江流域，而達於黃河流域，幾乎遍及於中國的全部。這次革命雖然失敗了，而在近世史上實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這不是一件歷史上普通的變亂事件。它的行動不是盲目的，它追求一個最高理想而欲其實現。所以這次是具有創造歷史的意義的革命運動，我們甚至可以說，從此的辛亥革命乃是這次革命的繼續，一種具有更前進的革命意識與行動的繼續。

太平天國的革命之策動者為洪秀全。秀全廣東花縣人，家境窮苦，父兄躬耕，使他入塾讀書，期望他將來能拾取功名，以光家族。他自己也以顯親揚祖為己任。十六歲後屢應試，不幸屢試均落選。他在鄉村教館多年，一日，偶得舊黨基督教徒梁發所著的勸世良言，讀之，大悅。他自行泛讀，毀偶像，及孔子牌位，創上帝會，專事祈禱上帝。

相傳秀全創立上帝會以前，曾和當時的天地會發生過關係。天地會是一種反清復明的會黨。自從諸人積復漢好之助入主中國，二百年中，滿漢之間，永遠是一個壓迫者與反抗者對立而明爭暗鬥的局面。滿人在軍事，財政，經濟，政治各方面既逐漸的完成其統治支配的地位，最後復進一步從文化方面，採取種種高壓手段對付漢人，企圖根本消滅漢

人的種族思想，永遠願受其宰割而不反抗。但是漢人終不屈服，在軍事的反抗次第失敗，以及一切可能的辦法都絕望之後，乃組織秘密會社，培養民族復仇的根苗，以為將來推翻滿清的政治的準備。康熙間，天地會成立。天地會又名洪門會，後來以洪福人的請忌，乃取洪字的三點偏旁而改稱三點會。其拜會時得誦中律四韻的詞：「三點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門英魂風。幾成說勢表仇日，誓貫通朝一掃空。」天地會常在粵中聚，曾屢起事，雖都失敗，但勢力未稍殺。道光末，魏源會道：「楚粵邊郡，奸民為天地會，煽惑成約，橫行鄉曲。冥役督其耳目，翼一呼百諾，更不敢聞」。黨與三省，通遞聚眾。論者謂邊防亂，在苗黨之右」。其聲勢之大可以想像。功名失望的秀全之加入這會，自屬可能。

天地會素不備有豐富的種族意識與反清情緒，又因會黨多為社會下層的貧苦大眾，失業游民，故又富有階級意識與仇富心理。中國自唐以後，經濟繁榮的情勢日盛，每當貧苦大眾為飢寒所迫而起反抗之時，那當殺官，擄盡報復。這種階級間的憤恨，雖在每次暴動中得到十分的發洩，然事過，而社會關係及貧富不均的現象依然存在。一種復仇的仇抗階級的階級意識，自然也很堅固的潛伏在社會下層貧苦大眾和失業游民的心中。故天地會的成立，為投合貧苦大眾的心理，為吸聚流亡者而歸

位，則接受這種意識自是必然的。他們結盟會同謀議，是「有倣同真，有衣同裳，有禮同使」；是「強不犯弱，眾不誣寡，智不誣愚，勇不害怯」。他們的信念，有如水滸傳所說，「八方共域，萬姓一家」；他們拜會證盟，是「以天爲父，以地爲母，一人共濟，都成兄弟，不啻是難，一器一般兄弟稱呼，不分貴賤」的。我們看秀全以後的所述所傳，與上述的宗旨多有相同，可說他和天地會關係之深。

但是秀全何以不用這個潛勢力強大的天地會，而必欲另創新團體，這自然有原故的。第一，天地會的努力最大，然山堂分時有交通而不統一，且會內層次森嚴。一個不第秀才加入這種會社，要想「一步登天」，做老大哥而統帥各山堂，是不可能的。第二，秀全對天地會的復明宗旨不滿意。認爲這種觀念已太陳舊，不足以吸引大眾。第三，因爲天地會的宗教意味比較淡薄，不足以醉服人心，使其誠信。以此，他遂中衍天地會的餘緒，刺取其舊的教義，獨樹一幟，稱爲上帝教，自爲教主，自爲領袖。

秀全的教義和主張中，還潛留有濃厚的儒家的倫理觀念與政治意識。他起事後，雖曾一度獎讀孔孟之書，然他終是儒生出身，曾熟讀聖賢經傳，所以自己仍不能掙脫此種思想的傳統勢力之約束。而且儒家的六而理想，以及「忠孝而忠不均」的均產主張，又都和基督教的教義，天地會的意念，可以調和而不矛盾。則古代儒家的言論之依然在他心中佔據着至高的地位，更自然不足爲異的。

他在鄉村教館多年，擬以生活。大約是因爲他教去塾中的孔子牌位和言論性說之故罷，不久便失業了。因此，他離開家鄉，和信徒馮雲山同赴廣西，另謀發展。他們到了廣西，在黔甯兩州流域一帶從事活動，宣傳。他們是客家人，所以到處可得客家人的擁護，行動甚自由。不久，便得到了一大武信徒。他們暗設機關，聯絡宗族，並作軍事上的種種

準備，待機發動革命。一八五〇年的冬季，他們遂在金田村起事，各地黨徒紛紛來會。同時，各地的天地會衆也都乘機暴動，造爲騷亂。他們自發動事變，以至定都金陵，爲時不過兩年餘，便靡孱了東周，成立了太平天國。這個天國的建造，和歷史上一般朝代的更迭不同。他是有目的，有理想的革命。這次革命，一方面是繼續前代的精神傳統，企圖推翻滿人的統治，而恢復漢族的自由這一點，他們在奉天討胡敬中講得很明白，文說：「曠自滿州肆虐，混亂中國，腥風播於四海，妖孽橫於五胡。凡有水旱略不憐恤，坐視其賊率涉流離，是欲使中國之人種少也。又縱官污吏，割民脂膏，士女皆受流道路，是欲我中國之貧窮也。滿州之所以愚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總料滿州之衆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萬，以五千萬之衆受制於十數萬，上孔之醜矣。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靈。公等苦滿州之禍久矣，至今而猶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蕩胡塵，其何以對上帝高天乎！予與義兵，上爲上帝報臨天之讎，下爲中國解下首之苦，務期肅清胡妖，同享太平之樂。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他方面

則本「均富貧」及「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諭救世人徵文)之宗旨，企圖消滅舊社會，舊制度，而建立一理想的太平的天國。這一點，他們在原始無世訓中也講得很明白，文說：「天下凡間，分言之則有萬國，統言之則實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國是皇上帝主宰化理，遠而番國亦然；遠而番國是皇上帝生養保祐，近而中國亦然。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我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輩，何得在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爾吞我并之念？」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邪說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而

今尚可望哉？然而亂極則治，暗極則光，天之道也，於今夜退而日升矣。惟願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跳出邪惡之鬼門，循行上帝之真道，時時天威，力遵天誡，相與淑身淑世，相與正己正人，相與作中流之砥柱，相與挽已倒之狂瀾，行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幾何垂憐薄之世其不一且變而為公平正直之世也？幾何極惡極之世不一變而為一善不犯惡，衆不暴寡，智不詐愚，勇不苦怯之世也？」

「這道醒世訓中所說的思想，得謂然地是基督教的教義，會此的觀念，和儒家的理想之結晶。他們不但是這道說，這道醒世訓的做。金田復變的太平，太平軍佔領永安，便建立國號，稱太平天國。『天國』之名。『天』於新約。其意義，據新約聖經馬太傳『天國近矣』下注解說：『天國是總天上地下而言，天上有天國，地下有天國，天上下同是神父天國。勿誤認單指天上天國。故太兄預言云，『天國過來。』蓋天國來，在凡間，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創開天國也。』天國是地上的天國，是天父天兄在凡間創立的『個理想國。』『太平』的意義，則是表示這個天國建立的目的。這一點，原道醒世訓中說得很明白的，說：『上帝原來是父親，水源不本急尋異。量寬異同皆同體，心好異人亦族人。獸畜相列還不敵，媳婦互殺斷非仁。天生天養和爲貴，各自相安享太平。』天國建立的目的，不在『天下一家』，不在『存此亡彼界』之私，『爾香我拜之念』，家家餽飯，人人和好，『共享太平』。』

『均貧富』是這個革命團體最大的目的。太平軍起義之初，便在軍中實行此理想。他們廢除私有制，設聖庫以管理公產。當佔領永安時，秀全曾下詔道：『天』詔令各軍各營衆兵將，各宜爲公莫爲私。自今，衆兵將凡一切私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數歸聖庫，違者嚴罪。』軍中設典聖庫官專管一軍的庫藏。同時，自天王以，政令，均無傳佈，一切衣食皆由典官發給。建都金陵之後，乃創布天朝田賦制度，根據士地國有政策，樹立一種共有共享的經濟制度。他

們解釋此新制度的實行，乃本於神意：『蓋天下皆是天父上帝上帝一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土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風屬平均，人人同極矣。此乃天父上帝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也。』其內容可分三方面：一是公田制。其辦法，先把田分成三等：『其出一畝，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爲上田，可出一千一百者爲上中田，可出一千斤者爲上下田；可出九百斤者爲上中田，可出八百斤者爲中田，可出七百斤者爲中下田；可出六百斤者爲下中田，可出四百斤者爲下下田。上上田一畝，當上中田一畝一分，當上中田一畝七分五釐，當上下田一畝三分五釐，當中中田一畝四分，當中下田一畝七分五釐，當下上田三畝，當下中田二畝四分，當下田三畝。』然後按照人口分配。他們是承認天下男女子女都是天父的子女，一律平等的。所以『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難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中田，好田各一半。』其受田的辦法，規定『凡男婦，每一人自十六歲以上受田多踏十五歲以下一半。如十六歲以上，分上下田一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其半，分上下田五分；又如十六歲以上，分上下田三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其半，分上下田一畝五分。』同時，又規定人民必須從事農業的副生產，『凡天下，樹種下以桑。凡婦孺蠶絲養蠶。凡天下每家，五母雞，二母養，無失其時。』人民每年耕種所得，不得全部佔爲己有，應歸公家。規定凡富收放時，兩司馬督佐長，除是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公庫。凡麥豆等麻布粗細大食物及銀錢亦然。』至於所受田，不用說，人民也不得視爲己業的。『凡天下田，天下八同耕。此田不足，則遷彼處；彼不足，則遷此處。』而且『凡天下田，豐稔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不得分『此疆彼界』，『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帝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饑。』





三點去考察。第一，民族運動方面：潛伏二百餘年的民族意識至此方昭然揭發，撼動了滿清統治的基礎，樹立了民族革命的先聲。同時，太平軍雖仇視滿人，然目的僅在爭求漢族的自由，故復倡「天下一家」之旨，不使民族主義流於狹義。義訓垂後，遂成有民族主義之世界理想的淵源。第二，民權主張方面：太平天國的典制率多更創，雖仍留有封建制度的殘迹，然此乃受時代環境的拘限使然。至其中，如守土官吏之規定由人民直接公舉，如管理制度之注重多次伸訴，使人民多得辯護的機會，如承認男女平等，禁絕娼妓，以及給予婦女參政的權利，皆適合民主主義的要求，而開啓民權運動的先河。第三，民生問題方面：太平軍的

發動革命，解決民生問題是其目的之一，且是一主要的目的。故太平天國的田賦制度實爲其立國精神之所萃寄。這種田賦制度是一種理想的公有制度，雖淵源於儒家的均產理論，而與現世社會革命的宗旨頗暗合。我們知道，「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解決生產的問題，就是分配的問題也是要同時注重的。」（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三講）他們的政策實是以「養民爲目的」，不僅鼓勵生產，更應注意分配，而且要分配得公平。這政策的推行，既適合當時貧苦大眾的要求，且成爲民生主義的首倡。

## 中國民族主義之發展與台灣革命運動

梁乙真

梁先生現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審組組長。著作頗富，已出版者：有元明被曲小史，中國文學史話，清代婦女文學史，民族英雄神話，中國婦女文學史綱。由他這篇文章，我們愈加認識了我們中國對於受日本壓迫的東亞各弱小民族負有解放與扶植的歷史任務。只有我們的三民主義才真正是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最高原則；也只有我們這次神聖抗戰成功之日，才真正是東亞各民族一律平等之時。

——編者

運動的一環。茲將兩個民族運動的歷史關係分爲四個時別，而簡述於後。

### 一、台灣革命運動的泉源

美國柯爾教授曾謂：「一個健全的個性有裨於社會，其一個健全的民族性有益於國際社會一樣。」這話是很對的。民族運動就是民族發揮其整個的民族性而努力奮鬥以求多福的一種運動。故民族精神，強大的民族和弱小的民族，在過去及現在，都自有其民族精神和民族運動。台灣雖說是一個孤處海中的島嶼，但在地理上，種族上，文化上很早就和中國發生密切關係。它的歷史，它的文明，它們民族精神與努力奮鬥以求多福的民族運動，與其說是台灣革命，勿謂就是中國民族

從歷史上講起來，台灣不但和中國的關係很深切，而且台灣是中國民族反抗運動表現得最高的地方。這兒原先住着的土著民族叫做土番，明天啓二年台灣被紅毛國（荷蘭）人佔據之後，就把他們趕到深林茂菁

中去了。荷人既據台灣，惟利是圖，它們一而接濟中國的海盜在船尾沿海一帶騷擾，同時對於粵閩兩省避離來台的華僑，施以極苛刻的經濟壓迫。那時鄭芝龍正營明勇總兵，駐在福建，他爲了想要清海盜，就必得來趕走荷蘭人，正好那時華僑領袖那堪因不堪荷人的壓迫，率領僑胞起爲鄭芝龍的內應，可是開戰的結果，只是荷蘭國人的大炮打敗了，華僑死者八千餘人，從此華僑兩方惡感日深，直到鄭成功時代，反清運動開始前，才把紅毛國人趕走。於是台灣完全成了華人的勢力，廣東福建人民遂大批渡海到台灣來住。鄭成功既據台灣，遂建設國家，號稱東都。聘區士陳永華爲謀士，設立中央政務廳，開荒土，修兵備，制法律，興學校，建城築廟，招致反清的明朝遺臣。那時在國內各省的遺臣，他看見國破家亡，只有台灣鄭氏打着明代的旗號，他們便都跑到台灣去，求一綫的生機。遺臣中最著名的人物，如徐孚遠沈光文等，徐孚遠是幾社的首領，他自從參與黃宗義宗義兄弟反清革命失敗之後，即跑來台灣作寓公，還組織海外幾社。沈光文文字間，號斯庵，鄞縣人，是同與「畫江之役」的一位革命家，後來事敗也跑到台灣，直作了三十多年的寓公。他看見鄭氏三世的盛衰。清康熙間鄭啓聖得了台灣，光文尚住在台灣，啓聖請他回鄉，但光文終久沒有投降清朝。他在台灣結有「福台新詠」，春結社的故事，作秘密宣傳民族主義的工作，不獨是「海東文獻」，播爲始祖，而且台灣後來的革命種子，也在這時播下，與台灣近代革命運動，有着很大的影響。這是我們研究台灣近代革命運動史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清朝全祖望的鮑培亭集卷二十七此次僕僕云：

「閩省轉啓聖語，公辭之，啓聖始書訊曰「管爾無恙」，因許遺人送公歸鄉，公亦頗有故鄉之思，會啓聖令李福齋光行也，爲之織肉繅采，旬日一候門下。時暑將已，范萬公漸光，乃與宛陵陳文琦，關中鄭興可，無錫華棖廷桂，榕城林莽丹吳集翰，山陽宗城，蠟陽王國蒸結社，所稱福台新詠者是也。感卒於諸

三民主義周刊

羅，率於縣之善化里東堡。公居台三十餘年，及見延平三世盛衰，前此諸公逸作，多以兵火散文，而公得保天年於承平之後；海東文獻，推爲初祖」。

當民國元年前二三十年鄭成功佔據台灣的時候，天南一片土，不獨是反清運動的大本營，亦且儼然具有一個獨立國的規模了。這門台灣，他們頭思用來做革命的根據地，慢慢地收復閩廣一帶，再慢慢地驅逐滿清，恢復中國的故土，只可惜那些降清的漢奸們（黃帶施琅），攻打得甚急，而鄭氏部下（傅爲霖高壽陳國威）也有暗中降清的，因此在鄭成功的孫子鄭克塽時代，終於在反抗了三十八年之後，被清兵所滅，台灣歸入滿清版圖。從此避離來台的十萬漢人革命運動，便墜入慢慢的長夜了。

二、台灣的反清及民主國獨立運動

施琅佔領台灣後的翌年（康熙二十三年），便改台灣全島爲府，分設鳳山台灣諸羅三縣隸屬於福建省。及至雍正六年，又改爲台灣道，添設淡水彰化二縣及澎湖一廳。但台灣道時的人民還是多明寧的遺民；他們的武力反抗運動雖然暫時被滿清統治者壓抑下去，然而他們的民族思想却非滿清的武力所能鎮抑，再加以在台灣作寓公的一班明朝遺臣更時時作文字的鼓吹，於是在台灣潛伏的會黨勢力便又起來掀動「反清復明」的怒潮，對於統治台灣的滿清官吏以迎頭的打擊。例如康熙三十五年吳球起事於台灣新港，四十年劉起事於嘉義一帶，六十年朱一貴起事自稱中興王；乾隆十五年黃黨起事於大鹿，此外如乾隆五十一年的林爽文之亂，嘉慶十五年的蔡宗之亂，他們這些「變亂」大都是與中國國內各地會黨所領導的「反清復明」運動起着共鳴的。這時在台灣的道清官吏爲了制服一羣「叛黨」，便建築炮壘，設備兵營，厲行保甲，組織團訓；但防患雖然嚴密，而暗中叛變之事實反愈多。及至中葉以後，內憂外

愚粉至沓來，清政府更無力牽制台灣，便不得不無形將台灣放棄了。

近代台灣民族主義勃興與民族運動的崛起，是受了馬關條約的刺激。這種民族思想的源泉，遠之可追溯到鄭成功時代在台灣作寓公的一班文化大師和潛伏下流社會之會黨屢次掀起的變亂，近之則受總理與鄭成功樹義黃旗而陳少白第一次革命的感召。當台灣人聽到清政府將台灣土地割讓給日本時，非常悲憤，因為他們的祖先過去無論在政治上文化上都與中國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現在一旦要和祖國分離，當然會激起全島四百萬人民的悲憤，起來力爭清政府的「割台之議」。但是台灣民衆的呼聲却不能喚醒「主和讓國」之權臣的迷夢，他們遂於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一日，由唐景崧劉永福丘逢甲的領導揭起守土禦侮的旗幟，設立台灣民主共和國。他們這一種復國誓仇的驚人壯舉，不但出倭寇意料之外，就是願預的清廷亦爲之咋舌！這批英勇的義軍起事之後，到臺北（唐景崧），台中（丘逢甲），台南（劉永福），都遍佈了義軍的旗幟。從時間上說，自台灣民主共和國永清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起，大小百餘戰共抵抗了二年之久，這不說不是台灣革命運動史上的奇蹟！自此以後，像劉大北，劉德鈞，陳寶，詹阿端，蔡清濂諸人的抗日運動，不過是這次民主國獨立運動的尾聲罷了。

### 三、台灣民族覺醒後的抗日運動

當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李鴻章與伊藤博文訂立馬關條約的時候，李鴻章對人說：「台灣地瘠民貧，瘴氣遍地，且多生番，國家每年要化費國幣數十萬金，而伊藤博文居然要它，我雖然表面上裝作不肯割讓的樣子，然而我心中却非常歡喜，惟恐伊藤博文不肯接受，割去一個台灣，就像割去一個癩一樣，本身反而輕快得多了。」這是中國大外交家的見識，他這一來不趕緊就把台灣四百萬的人民送進了奴隸的地獄。

自然這個「癩」一樣的台灣割歸日本之後，台灣在經濟上成了「被統計的標本」，在軍事上成了日本南進的橋樑。日寇爲的想教台灣民族俯伏於自己的胯下，便在台灣遍佈了益於虎狼的苛政，如「六一法」，「一六三法」，「保甲制度」，「匪徒懲罰令」等；而最可恨的是在台灣的日本警察，一手拿刺刀，一手拿墨盒，對於台灣人民操生殺予奪之權。日人田川大吉在其所著的台灣訪問記中曾談到日本統治台灣的政制，比較朝鮮更爲殘酷，更爲專制。例如：一、總督任陸軍武官時，得兼任司令官，這種是台灣有而朝鮮無；二、地方警察由朝鮮有而台灣無；三、保甲制度台灣有而朝鮮無；四、朝鮮有朝鮮文字的報紙而台灣則無。一在這種情形之下，台灣人民所處的簡直不是一人問世而是一修羅場。

但是台灣民族並永不遠是馴服的羔羊，他們也會挺身而起作覺醒後的怒吼。還在滿清統治台灣的二百多年中，台灣的民族運動就沒有停止過，當時在台灣民間流行一種「五年一戰，不算大戰；三年一戰，不算小戰」之諺語。及至台灣爲日本所合併，四十多年間的革命運動更如雨後春筍，達數十次之多；在世界革命史上，造成空前的紀錄。

民國五年，總理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以五族共和建立中華民國，此種慶事予台灣革命家以極大的鼓勵，激發其打倒日本之決心。就在這一年中，台灣發生了四次革命。三月二十二日劉乾聖黨人攻項林日警派出所，斃敵數人；可惜黨人未經訓練，事機洩漏，被日寇逮捕，判處死刑。五月二十七日，台南革命領袖黃朝祿發動，爲日警所悉，逮捕處死。但這兩次革命失敗，非特不足以壓抑台人革命之火焰，反激起陳阿榮台南之起義。陳阿榮爲一平民，他鑒於劉乾聖的慘死，憤恨異常，乃扶掖而起道：「陳阿榮是不怕死的，誓當殺盡倭奴，光復台灣，以步先烈的後塵。」十月十日爲中國雙十節，陳阿榮就即欲借此機會，召集民衆開會慶祝，同時起事。但這事早爲龍騰的日警知道了，陳阿榮

等悉數被捕，處以死刑。當陳阿榮在監獄的時候對他的同志說：「我們死就死，但恨未能多殺倭奴為憾，然台灣的阿榮當意殺愈多！」

陳阿榮雖說失敗了，但接着就是羅福星革命運動。這時台灣人民由於前八次革命的全敗，一面對於我國革命的成功，同時又因民族獨立運動的潮流激盪於全世界，所以都磨礱磨礱，躍躍欲試，以期一舉而打倒日本，光復台灣。羅福星等即在此種濃厚的革命空氣中秘密組織革命總機關，召集幹部會議，決議以羅福星、劉士明、謝雲軒、邱維藩、林連榮、劉金甲、楊中興、江亮龍、黃光福、黃良敏、謝雲軒、傅清風等十二人分南北兩路募集黨員，不到數月全島黨員竟達九萬二千五百餘名之多，乃於民國二年三月十五日發表宣言，藉以引起民族革命的同聲。但不幸苗栗地方的秘密機關敗露，羅氏亦於十二月十九日被捕，至民國三年三月三日，羅福星張火燭李阿齊及其黨人一百四十三名，以一反鎮一的罪名，死於台北監獄之絞首台。

就在這年的五月間，羅阿頓憤羅福星革命失敗的慘死，乃與同志陳天生彭漢文募集黨員四百餘人繼續與日人奮鬥，勇往直前，進攻警署。不幸失敗，彼等於次年二月被殺。民國五年，日人乘歐戰方酣之際，佔我青島，並提出併吞我國的二十一條件，而帝夢沉淪的袁世凱，竟於五月九日簽字承認。那時，總理正居留日本主持中華革命黨籌劃討袁軍；而受日本壓迫最深並富有革命性的台灣同胞，聞此消息，乃亦起而作反日的運動，余清芳就是挺身而起的一位。他為得到羣衆擁護的力量，欲藉神道設教，號召台民，自稱大明慈惠國。他率領同志羅俊，江定，謝阿榮，張重三等五六千人於五月間開始向日警署進攻，初尚勝利，後因槍炮不足兵力單薄，終遭失敗。日人乃於八月二十五日在台南臨時法院判處余清芳，江定，汪乾盛等以極備酷的死刑，同時判處死刑則達一千三百四十七人，造成世界裁判史上空前未有的紀錄。

#### 四、現階段的台灣革命運動

可是台灣是中國民族反抗異族的壓迫而興起的。台灣民族反抗的精神是有遺傳性的，他們決不會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軍艦大炮及殘酷的手段下而稍為低頭的。所以自從林大北劉余清芳的十二次革命運動，雖然都遭受日寇的慘敗，但台灣人仍不屈不撓進行他們的獨立運動。當民國十四年總理逝世的時候，台灣人起了一次獨立運動。一西望中原，不禁淚珠兒洒洒不絕！這是總理逝世的時候台灣爆發的那次運動宣言中的語句。現代中國民族舉起抗戰的大旗，與日寇作殊死戰鬥的時候，台灣民族也本着先烈的革命精神，乘機從事復國運動，於今年二月十日正式成立台灣革命同盟會，以為民族解放的先鋒。這位同盟會的領袖劉啓光氏曾經鄭重地說過：「（一）三民主義之民族原則，適用於台灣革命；因自鄭成功對抗異族，以迄於第一次抗戰，三百年來全為民族主義之革命。（二）台灣人以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為台人，而台人已有四十六年脫離祖國，故有改變革命運動目標之必要，不但需要恢復獨立，更需要求從事復國運動。這兩個原則是非常正確的。」

我們希望他們趁着這個偉大的時代，本着這兩大原則，與中華民國旗幟手並進地負起革命先烈的所賦與這兩大民族的歷史任務，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以實現我們共存共榮的目的。

美國大使羅森於四月廿日在南開中學演講，題為「民主主義」，聽衆二千人。他於辯護民主的演詞中，特別提出我們的三民主義，是和美國的大憲章，美國的獨立宣言一樣，實民主政治的福音中最高不朽的偉著。

# 綏蒙前線歸來 (通訊)

張真鼎

距陪都約有五、六千里地的路程，在陪都的正北面，爲我國抗戰最北的戰場，便是綏蒙前線。由陪都出發，經過陝甘兩省境界，北行入甯夏境，過甯夏省垣後，沿黃河北行，漸入荒涼區域，經過禮口縣的沙漠，有三百里左右，絕少人煙。旅行省騎馬或坐木筏前進，有五、六天的光景，除住宿的小店外，不見人跡。到了三極公以後，便入「後套」區，這裏因爲水利灌溉的便利，原來的草原或荒地，大半開墾，一直到臨河，五原，安北等縣，都用引黃河水渠灌溉耕田的辦法。出安北處由「前山」到包頭，便又是荒涼區域了。

這裏所說的後套，主要的是指五原，臨河兩縣，和安北縣的一區。這一個區域南至黃河，西，北，東三面都以人工鑿成的渠道爲界。在後套以內，一切極度繁榮，極度活躍；在後套的周圍都是一片荒涼。這一個後套區便是我們北戰場抗日的根據地。

約在一年以前，北戰場上忽然克復了一個大據點——五原。這是我們抗戰以來收復的第一個大據點，當時，全國興奮，賀電如雪片飛來，各地的盛譽團，一批一批的前往慰勞軍民，從此後套引起了全國的注意。但是如果你如果在陪都的街上問市民「後套在那裏」，則十有八九是答不出來的。因爲這個緣故，作者願意把後套的情形，大略地介紹一下。

後套的存在，完全靠水利，「無水利便無後套」，這是當地人人人曉得的道理。後套的民衆約有二十萬左右，大部分是靠農田畜牧生活，極少數的人民是經營手工業或商業。後套內有五原一縣成立最久，漢朝便有

五原郡。臨河則到了民國十三年，四年才設治的；第一任的臨河政治局長便是蕭振麟氏。五原縣在近年來，爲人注意的原因，第一是因爲北伐時馬玉祥，于右任，馬鴻逵諸氏，曾在五原審過師；第二便是去年五原之戰。

後套可耕的土地，有十五、六萬頃「百畝」；現時實際耕種的土地不過二、三萬頃，尚不及可耕地的五分之一。此中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水利問題。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氏，雖在戎馬倥傯，軍書旁午的時候，對於省政的振刷，未曾放鬆。如修築渠道，開墾荒地，整理土地，推行農貸，實行植林，擴大春耕等要政，都在積極進行中。對於手工業亦然，如毛織品，酒精，紙等製造都在積極提倡推動中。因爲後套四面交通不便，後方接濟運輸，十分困難，爲解決民生問題，一切必須謀求自給。能夠自給，一切才有辦法。

但是講求自給，尤其在前方講求自給，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情。前方無木材，修房屋要用芨芨草，將芨芨草束成捆，權作木材用。前方無桌椅，一切桌椅都是用泥砌成；學校上課與機關辦公都是用的泥桌椅。門窗窗框，都用芨芨草編成。因爲沒有洋紙，火爐煙筒，也是用芨芨的。造紙用芨芨，燒火用芨芨。所以前方有兩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東西，一樣是泥土，一樣是芨芨。這樣的，在百餘困難之下的後套，也居然能自給了。

糧食在後套是不缺乏的。抗戰以前，一塊錢可以買四十斤白麵，現

可以買八十斤魚。現在的物價雖然有的到了五倍、十倍，甚至二十倍了，但是拿金銀錢，在全國還數發後最便宜。後套向來不種棉，所以棉花棉布，十分珍貴。後套人多用毛或毛織品。老百姓冬天穿的是浸布面的白皮襖，夏天呢？全非用布不可，但都是舊布。

後套的自給，雖然還沒有做到完備的地步，但是老百姓很樂觀，民氣很振奮，抗戰的熱潮很高漲，軍民的關係十分良好；每次戰鬥，都有許多民衆協助的美談。五原戰役時，有小腳婦女抬傷兵，爲全國各戰場上的珍聞。有一個鄉長曾率領鄉衆殺死十餘個敵寇，有一團長，身受重傷五處而由老百姓抬到家中養好送回部隊，諸如此類的義舉，不可勝述，所以說，前方的老百姓，實在太好了。

軍院呢？一般的口說是階傷不退，重傷不喊，醫院設備不好不怨，醫死不任俘虜。現在抗戰期內，國家太困難了，全國有多少傷兵醫院呢？政府那有這許多財力能把個個設備好，所以醫院設備不好，是當然的，祇要醫官有情懷便好了。作俘虜是最可恥的事，就是受了重傷，不及拍下來，也要將一雙手榴彈，枕在頭底下，等到敵人接近的時候，將引線一拉，與敵人同歸於盡。這種壯烈的事件，在前方是數不勝數，記不勝記。

黨員呢？也嘗試裝起來了。從前文編寫的黨部同志們，一個個都參加了綏遠自衛軍，到敵區打游擊去。綏遠自衛軍，是綏遠省黨部的同志們組織起來，領導起來的。雖然他們缺乏軍事技能，但也曾經在敵區裏和敵人奮鬥過三年，在大青山裏保持了一塊游擊根據地，始終不曾輸給敵人。最激進激烈的民族英雄，范雲同志，曾經率領自衛軍，襲入綏遠省會的十字街，他不過是一個縣黨部的書記改行的。所以自從抗戰以來，綏遠省的黨部同志們，實在無愧於黨國。他們如果有錯誤，是因為技術不佳，能力不夠。至於忠黨愛國的熱忱，實在是足堪稱許的。

後套是漢蒙雜居的，所以要抗戰勝利，必須把漢蒙關係弄好。現時

然有此民族的取類參加了敵僞工作，如德王，李守信等便是。但同時也有許多有志的蒙籍青年，奮起參加抗戰，領導抗戰。最爲一般人所注意的，如後套的兩位女英雄，奇偉舉，巴業英便是。奇偉舉是魯公族的女王，巴業英是取公族的女王，這兩位女英雄，都做了女司令，可以說是當今的花木蘭，還是階部的人們都聽得的。

最後，我們必須提到後套黨政軍的領導者，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氏。傅氏的勤勞，刻苦，堅強，負責，有果斷，有決心，都是全國人士知道的。他日常的生活，自朝至夕，沒有休息的時候，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他的最大長處，便是喜歡接近士兵，接近民衆。士兵的疾苦，民衆的疾苦，都和他自己的疾苦一樣，務須用最迅速最有效的方法，予以解除。他喜歡接近青年，所以許多青年都樂到前方爲國家效死。傅氏年富力強，富有革命朝氣，在綏遠主政十年之久，所以今天在淪陷的省份，提起傅主席來，還有很大的號召力量。

講到淪陷區，就該說：綏省共有十八縣局，現在完整未淪陷的，祇剩下五原，臨河，東勝，沃野四縣局，僅淪陷一部分的爲包頭，薩拉齊，托克托，安北四縣局，其餘綏中，綏東十縣完全淪陷了。綏遠黨政軍原有烏伊兩盟，十縣特設，及由察哈爾移過來的東四旗；現時伊盟全境完整，烏盟尚保存一部分（最主要的便是東公、西公兩旗），其餘都淪陷了。就面積言；淪陷區域約佔全省面積的一半。就財富言，則除五原、臨河兩縣外，全省的精華大部分都淪陷了。

現時淪陷區怎樣辦呢？我政府均派有專員縣長。綏中的專員，常駐大青山游擊根據地內。經東專員呢，在游擊區內，消滅匪定，廢不販吸，日夜巡邏，與敵周旋，並開展敵區行政。當初派的經中專員便是現任政員張超民氏；經東專員，現仍留任，是趙鳳師氏；他們兩位都是留日學生，不過三十餘歲，都是不黨不黨忠實同志。經東的優秀青年，富有救國熱忱，志行純潔，在做專員以前，並未做過行政工作。張超民氏奉派

便僱自衛軍于司令返大青山工作去了。趙厲師呢？當時拿了一紙派委狀，藏在衣縫裏，帶了兩支手槍，四個工作同志，便回敵區行使專員的職權去了。吾黨青年同志的勇敢，熱忱，沈著，智謀如此，令人興奮。他們回到敵區後，拿出省府主席的招牌，號召民衆，編練民軍，行使專員職權，深得老百姓的擁護，以與我方軍事呼應配合。

現在呢？自從去年五原戰役前後，我方正式與敵人決戰的時候，在淪陷區內，彼所謂我們的友軍——某集團軍的支隊——用欺騙的方式，乘我不防的時候加以襲擊，總專員僅以身免。自此以後，我游擊部隊，在淪陷區內與某支隊，遂不時正式衝突。而某支隊罵我政府官員爲「漢奸

」，「準備投僑」，混淆淪陷區民衆視線，影響敵區工作甚鉅，言之令人痛心！

在敵區工作的青年同志們，出生入死，赤手空拳，一方面要與敵僑鬥爭，一方面還要防僑「友軍」，艱苦萬狀，態度怡然自若，這當然不能不歸功於黨的多年訓練及傅主席的領導。

現在三民主義青年團經遠支團部籌備處正式成立了，由袁祝三，趙仲容二氏負責。袁趙兩氏從事青運，素有經驗，青運工作的開展，一定會有一個光明的前途。

## 蔣委員長的任務

文·赫·丁著 | 中國領袖蔣介石

試看命運付與他統治的，是個什麼樣國家！而且不僅要他統治，還要他來統一起來！試想怎樣來統一一個「人民之海」！而這些民的民族對價更是複雜萬分。原來中國不僅是一塊土地，不僅是一個國家，它本身便是一個大洲，……那真需要超人的力量，纔能把這些紛歧錯雜的人民變成具有現代思想的有訓練的國民，而這些人民，都具有亘古以來牢不可破的偏見，和頑固已極的觀念，看來都要使我們眼花繚亂，若把這樣一個四萬五千萬人類之海，變成現代化而成為有組織的整體，真是難乎其難了。若把這樣一個巨大無比的工作實現出來，真需要千千萬萬有力量而具有信心的改革家，來化費幾世紀的光陰。從這樣一個雲霧迷天的人海之中，在一個浙江中產的家庭中出現了一個人。這人對他自己力量有無限的信心，他堅決相信上帝是會幫助他的，他極端相信中國人民的忠實誠厚，相信他們能渡過苦海而轉昇彼岸；……他在他的眼前，他看見了一個統一的國家，一個堅強而團結一致的組織；「一種對敵人的堅強抵抗；一種孤苦無依受有汚吏壓迫的人民，將要提高其生活水準；一個世界上物產最豐富的國家，將要利用其一切資源而藉助其人民之堅苦耐勞，成爲最強大的新國家。這人具有各種必備的條件來担負他的巨任使命。他的忠誠，紀律，與工作的堅實修養；他在保定軍官學校的訓練；他的遠大眼光與遠達心胸；他留日數年通過中山先生所獲得的世界智識；他在莫斯科的軍事研究；他在黃浦軍校辦教育的經驗；他的鋼鐵般的北伐事業；他在山東事件中對日本辦外交的明敏手腕；他和南北軍閥的明敏周旋；……所有這一切的一切，都鍛鍊他成爲一個非常人物，具有敏銳的意志，鋼的性情，水晶似的判斷力，充分體驗出人類性格，因而使他，以相當甚至比他舉起他的堅強有力的手指導他們迎接新時代，使他們獲得精神與物質的自由，發揚他們的自尊心與榮譽心，藉以達到國家強盛、光榮、與偉大之境。他最偉大的雄辯才向廣大的羣衆說教。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演說家，像天神似的出現於民衆之前，志欲拯救中國免於危亡，拯救中國人民逃出苦海。